

从小说叙述学到广义叙述学

——赵毅衡叙述学思想综述

孙 少 文

(四川大学 1.文学与新闻学院;2.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207)

【摘 要】赵毅衡的叙述学以符号学为理论基础,从小说叙述学发展到广义叙述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小说叙述研究中,赵毅衡从叙述者出发,论证了叙述中普遍存在的“叙述自指悖论”,提出叙述形式—文化批评论,突破了结构主义叙述学模式的文本中心局限。21 世纪后,赵毅衡基于他所发展的符号学,将叙述研究扩容至文化中的全部体裁,提出叙述的底线定义和体裁全域分类标准,重新审视和解答诸多叙述基础问题。广义叙述学跳出了小说为中心的叙述学模式,开启了叙述学的第三阶段。

【关 键 词】小说叙述学;广义叙述学;赵毅衡;符号学;形式—文化批评论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09(2023)05-0010-07

From Novel Narratology to General Narratology

——A Summary of Zhao Yiheng's Narrative Theory

SUN Shao-wen

(1.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2. Institute of Semiotics & Media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Abstract: Zhao Yiheng's narrative theory is based on semiotics, extending from novel narratology to general narratolog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n the study of novel narrative, he has started from the narrator and demonstrated the “narrative self-referential paradox” that generally exists in narrative. He has also proposed the narrative form-cultural critique, breaking the limitation of the text-centered mode of structuralist narrative theor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based on his developed semiotics, Zhao h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narrative studies to all genres of culture, proposing the bottom-line definition of narrative and all-genr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re-examining and answering many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narrative. General narratology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novel-centered narrative mode, and has opened up the third phase of narrative studies.

Key words: novel narratology; general narratology; Zhao Yiheng; semiotics; form-cultural critique

DOI:10.13805/j.cnki.2095-7009.2023.05.007

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赵毅衡的叙述学思想历经了两个发展阶段:小说叙述学和广义叙述学。他的形式—文化论,也伴随着这两个阶段而建构和完善。在小说叙述学阶段,赵毅衡的研究重心是中国白话小说和中国文化批评,提出和初步实践了形式—文化论。广义叙述学是形式—文化论走向一般的意义形式理论的关键领域。随着形式—文化论所关注的现当代文化现象,广义叙述学意在覆盖文化中的全部叙述体裁,来摆脱国内外叙述学至今未变的小说中心窘境。

一、第一阶段:小说叙述学

赵毅衡的小说叙述研究可以概括为两方面:推演论证“叙述自指悖论”公理,提出和实践叙述形式—文化批评论。代表专著是《当说者被说的时侯:比较叙述学导论》(1998 年初版)^[1]和《苦恼的叙述者》(1994 年初版)^[2]。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工具,后者是前者在中国晚清到五四前白话小说的具体应用,二者共同构成赵毅衡小说叙述学理论与实践。

【收稿日期】2023-06-16

【作者简介】孙少文(1993—),女,江西抚州人,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叙述学、符号学研究。

(一)叙述自指悖论

赵毅衡认为,小说叙述中存在着一个根本的悖论:叙述者是叙述的发出者,而叙述者又是处在叙述结束后所形成的叙述文本中,即叙述者是被自身叙述出来的;也就是说,叙述者要在叙述完成后才形成自身,但自身却是叙述的起端。

在这一悖论的引导下,赵毅衡集中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因为叙述者的形成必须回到叙述者叙述这一点,所以,需要回到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及所构筑的叙述文本,去找出叙述者显示自身的各种痕迹。对此,赵毅衡主要从叙述主体的分化来分析,包括叙述者与叙述主体中其他成分之间的张力关系,以及叙述者自身的分层互动。第二,有没有可能叙述者可以叙述出自身,也即叙述出叙述行为,如果可能,是何种方式。根据叙述分层和跨层,赵毅衡找出回旋跨层的方式。

1.叙述者显示自身的方式:叙述者和叙述主体其他成分的互动

叙述主体,作为叙述意义的来源,是分化的,即叙述主体分散在叙述不同层次和要素上,主要包括人物、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从这一立场出发,赵毅衡分析叙述者和人物、隐含作者,以及叙述者自身不同层次之间的动力关系,判断叙述者的声音、对叙述意义的控制、显隐形态和身份等,从而找出叙述者各种显身方式。

首先,在叙述者和人物关系方面。叙述者显身方式有显身为人物兼叙述者(第一人称),或者隐身(第三人称),或介于中间的半隐身形态,当隐身或半隐身时,叙述者常以各种干预手段来发出声音,包括评论性干预、补充性干预和解释性干预。

其次,在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关系方面,“不可靠叙述”问题是讨论的重点。在广义叙述学阶段,赵毅衡给出了更为全面的论述(详见下文“广义叙述学”部分)。在小说叙述学阶段,赵毅衡主要是质疑、修正和完善了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和布斯(Wayne Booth)的许多关于不可靠性标记的看法:叙述者可靠与否,与叙述者是否戏剧化或显身不一定相关,并举例说明了“第三人称”叙述中叙述者也可能不可靠;叙述者兼人物在性格、道德、智力上有缺点,不一定是不可靠标记;叙述者可靠程度和叙述干预正相关;不可靠叙述是叙述者与其他叙述主体的意识发生冲突,和反讽概念有所不同。

2.叙述者叙述自身的方式:叙述分层、跨层、回旋跨层

以上叙述者和其他叙述主体成分的互动,大多是叙述者局部“露迹”,然而,叙述中还会出现叙述者另给出一个似乎完整的叙述者的现象,这种叙述者再创造一个叙述者,带来了叙述分层,并引发了叙述层次之间互动而成的复杂格局。

叙述分层问题可追溯到1970年代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叙述话语分析^[3],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叙述分层原则,致使该问题未能实质推进。赵毅衡首次明确叙述分层的原则,在此基础上论述叙述分层、跨层的基本格局,叙述分层的叙述学功用等问题。

赵毅衡认为,叙述者的转换是叙述分层判断的依据。叙述分层基本格局可以是三种:上一层次的人物成为下一层次的隐身叙述者,不介入下一层次的故事;上一层次的人物介入下一层次的叙述,成为下一层次的叙述者兼人物;上一层次的叙述者兼人物成为下一层次的隐身叙述者,或者叙述者兼人物。

叙述分层的叙述功用,首先体现在叙述跨层上,叙述层次之间可以进行叙述干预,如上一层次的叙述者可以解释、评价下一层次;但更重要的叙述功用,是给下一层次叙述者一个实体——不过,这种叙述者实体并没有解决源头叙述者,或最高一层叙述者的来源问题。赵毅衡发现,在叙述中会出现下一层次的叙述讲述了自身的生成,也即讲述了源头叙述者是如何产生的,这种从下一层侵入到上一层并决定下一层叙述自身的生成,即回旋跨层。赵毅衡指出,《镜花缘》是中国第一部出现回旋跨层的小说。

至此,在小说叙述中,叙述者如何叙述自身问题上,赵毅衡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叙述分层提供了下一层次叙述者的实体;而整个叙述的源头叙述者要显示自身,只能是在下一层次的叙述中,以颠覆叙述层次的先后顺序,反向跨越到上一层次的源头叙述中,来叙述自身的生成,这违背了源头在前、生成在后的逻辑,整个叙述文本的分层结构最后无法自治。叙述中以回旋跨层的方式,来叙述源头叙述者,即叙述叙述行为的产生。

(二)叙述形式—文化批评:内涵、方法和应用

叙述行为可以叙述文本中的一切,但不可以符合逻辑地叙述叙述行为本身;叙述行为本身无法自足,处处会显露出叙述行为操作的痕迹,比如

叙述中不同意义主体间的冲突、叙述干预等等。然而,长期的叙述实践已经将这些痕迹程式化、自然化。叙述行为似乎是独立的整体,这导致了叙述有机统一和具有逼真性的幻象。回旋跨层整个地颠覆了叙述形式的分层格局,引发了“被生成的叙述来叙述自己的生成”这种逻辑悖论。它打破了叙述自足的幻象,暴露了它是人为的产物,是人类文化实践的一部分这一事实。这一事实表明,要解释叙述行为源头,最终要回到文化意识形态中去。这便是得出叙述形式—文化批评的逻辑过程。

叙述形式—文化批评基本观点是:叙述形式可以跳过叙述内容,以形式内部的冲突为突破口,直接抵达到文化意识形态,其中的途径,便是回旋跨层及相关的叙述暴露自身操作的痕迹。这种从形式内部突破到文化批评,呼应了从结构主义式叙述学到后结构主义叙述学的转变。形式—文化论的提出,印证了90年代的中国叙述学界已经赶上西方后结构主义叙述学的潮流。

要找到叙述形式内在的冲突、矛盾,需要特定的叙述解释方式。赵毅衡借鉴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P. Althusser)提出的“症候式阅读”,在叙述学领域,用它来指寻找社会文化形态与叙述意指过程之间的差距的阅读—批评。症候式阅读—批评要求我们承认:叙述作品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压力,其内容和形式之间难以完美结合,正是从这些不完美处,从叙述行为留下的各种痕迹中,发现社会文化形态的有限边界,而为了能看到这些不完美处,就必须拒绝作品规范,拒绝作品造成的现实幻想,获得并保持超越性批评距离。

在《苦恼的叙述者》一书中,赵毅衡分析了晚清白话小说中拟书场叙述格局的变化,及叙述者地位危机和操作操控策略,探讨了背后的文化因素,包括亚文化在主流文化压力之下的顺从和偏离等。这是将形式—文化批评论运用在中国小说的一次尝试,证明了该理论的有效性。

二、第二阶段:广义叙述学

基于小说的叙述学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小说体裁,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难以突破。比如,以讲述模式来理解叙述,将叙述者认定为人格形态,导致在“第三人称”叙述,或说叙述者隐身的叙述中,较难确定一个明晰的人格形态,进而在“第三人称”叙述中叙述者可靠性问题上莫衷一是。在小说叙述

学阶段,赵毅衡对此有所察觉,但主要是以反例来说明第三人称叙述者可以不可靠,而具体论证,有赖于对叙述者形态新解,而新解需要以走出小说这一体裁为前提。此外,赵毅衡找到了从形式内部突破到文化的形式分析路径,但是受小说文本为中心的叙述形式分析惯性影响,形式分析主要还是从结构主义叙述学形式分析关注的诸要素(叙述分层、视角方位、语言行为)出发,从形式到文化中间的“逻辑跳跃”,单结构主义分析中的那些形式要素并不全面,其他形式要素,如体裁、媒介、文本的接收主体和解释等等,都需要纳入叙述文本中,而这些要素,在广义的叙述体裁中更容易被考虑到。

赵毅衡对上述局限和原因有着深刻的体察,21世纪后,他从小说叙述分析逐步拓展到广义叙述研究。广义叙述学从叙述作为一种符号意义活动出发,确立叙述的底线定义和叙述体裁全局分类标准,由此串起一系列叙述学基本问题。叙述定义、叙述分类、叙述主体,和叙述过程这四个部分,基本涵盖广义叙述学主要研究问题、基本观点和关键见解。

(一)叙述底线定义:“人物参与”“时间向度”和二次叙述

叙述是有情节的符号文本。根据在符号学中给出的符号文本定义,赵毅衡建议,任何叙述应当符合如下底线定义。一个叙述文本包含由特定主体进行的两个叙述化过程: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中;此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4]。

该定义包含了三大关键论断:第一,事件变化必须有人物参与,这是区分陈述和叙述的关键;第二,叙述的时间意义是接收过程中解释出来的,这是摆脱小说叙述传统所认为的叙述必须“过去时”的关键;第三,接收主体的解释,即二次叙述化,是叙述过程完成的保证。这三大论断基本说清楚了叙述文本和符号文本的区分与联系、广义叙述学和小说叙述学的区分与联系。后两个论断有关叙述体裁和叙述过程,下文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会展开,这里仅阐释第一个论断:

人物并不一定是说具有人的外貌体态特征,但必须“具有一定经验能力,并且能做出具有一定的伦理意义的行为或感受”^[5],也即,人物要素的关键,在于具有人的伦理取向的主体意向。

“人物参与”是在意义和解释方式上区分叙述

和陈述的关键。一方面,不卷入人物的事件变化,一般为用于描述自然、纯数理逻辑变化的陈述,缺乏人物所携带的伦理价值意义,而传达其他符号意义,如自然变化、数理公式等。如果伦理意义缺如的描述也算作叙述,那么叙述在意义上就失去了它的特殊性,而化为普遍的符号意义。因此,卷入人物的事件变化在意义上,保证了叙述的人文伦理意义。另一方面,卷入人物的事件变化具有人物经验、伦理意义带来的主观性,它要求叙述理解主体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经验和认知能力,能够相应地采取解释策略。如果事件变化不卷入人物,接收主体无需特别的解释能力,只需采取对应式接收,这一般是陈述的接收方式。

(二)叙述分类:三个区分标准

凡是符合上述底线定义的,都是叙述,都应当纳入叙述研究。广义叙述学关注叙述一般规律和本质特性,在面对远不止小说的广义叙述体裁,需要提出能够适用这些体裁分类的一般标准或原则。

一方面,所有的叙述都面对与现实的关系和距离,因此,叙述本体问题是叙述分类的一个维度,赵毅衡提出了两个标准:“双区隔”原则、文本世界“通达性”。这两个标准共同用来区分纪实叙述和虚构叙述。另一方面,所有的叙述都要彼此区分,否则无法形成丰富各异的人类叙述实践。因此,叙述内在区分是叙述分类的另一个维度,赵毅衡提出了文本意向性这一区分标准。

1. 纪实类和虚构类的区分:“双区隔”原则和文本世界“通达性”

一般来说,叙述本体类型,主要是它与实在世界的关系,但是对于实在世界而言,它又有赖于与可能世界对比,来界定清楚自身。所以,要说清楚叙述本体类型,涉及的,不单单是叙述文本与实在世界的关系,还有与可能世界的关系。赵毅衡即以叙述文本与实在世界、可能世界这二者的关系,来区分叙述本体类别。

按照“双区隔”原则,与实在世界进行第一度区隔后形成框架,框架内所进行的那个叙述,是纪实叙述。所谓的“第一度区隔”,是指实在世界的经验被媒介来再现替代,再现替代的媒介可以是具形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区隔之后只保证所形成的是符号文本,只有当文本里有情节要素,区隔出来的才是叙述文本,所以,叙述文本区隔之后自然形成的是叙述框架。此“框架”与叙述者框架形态的那个“框架”一致(下文“叙述主体”部分讨

论),这也是为什么在讨论“双区隔”时,有时也把“区隔”叫做“区隔框架”。在一度区隔后形成的叙述框架内,叙述接收者可以把再现的要素放到经验世界中去确证是否属实、是否可信。这种可确证关系,即是说叙述文本与经验世界是直接相关。

在第一度区隔基础上的二度区隔,对再现替代的媒介进行再度媒介化,区隔而出的第二层框架内的叙述,是虚构叙述。所谓的“二度区隔”,是指那个被再度媒介化的世界已经不是实在世界,而是第一度区隔后的那个叙述文本世界,这个叙述文本世界与经验世界间接相关。所谓“间接相关”,是说叙述接收者无法将这个框架内的叙述各要素拿到经验世界中求证是否属实、可信。

“双区隔”原则是着眼于叙述文本与实在世界的关系,而文本世界的“通达性”是对叙述文本与可能世界、实在世界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区分纪实和虚构体裁。

所谓的文本世界和“通达性”是这个意思:纪实叙述和虚构叙述都创造了文本世界,相比实在世界唯一、细节无限饱满的特性,文本世界是多重的、片面的、局部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可以构筑出可能世界,包括赵毅衡区分出来的准不可能世界。因此,文本世界与实在世界、(准不)可能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锚定和连通的关系,也即“通达”,通达的出发世界是文本世界意义的基础语义域,决定了叙述文本是纪实或虚构。纪实叙述的文本世界,和虚构叙述的文本世界,在“通达”上恰好相反。纪实叙述基础语义域是实在世界,目标世界不可避免的是可能世界,而虚构叙述基础语义域是可能世界,目标世界可以是实在世界、可能世界,或准不可能世界。因此,两种叙述在与实在世界和可能世界关系上的区分是:纪实叙述以实在世界为基础,虚构叙述以可能世界为基础,并且虚构叙述可以通达实在世界、可能世界、准不可能世界,实现“三界通达”。

2. 记录类、演示类、意动类三种基本类型区分:文本意向性

“意向性”是意义活动的出发点,在现象学、符号学、分析哲学都有作讨论,而文本意向性,在符号学、分析哲学中,被表述为“模态”“语力”等,学者们用它来分析语句、命题,进行文本分类。赵毅衡整合前人对文本意向性的不同表述,论述这一概念具有从语句、命题、文本等扩大至体裁的潜力,延伸发展为一套叙述体裁分类方案。这是文本意向性作为体裁分类的首次全面系统应用。

文本意向性是叙述过程中各种意义意向要素在文本中的抽象集合。发送主体出于一定的意义意向来组织情节,意义意向通过情节化组织进了叙述文本,再现为各种文本形态及其标记中(如语言文字、身体媒介、图像等)。这些形态标记携带着不同的语力,不同语力在接收者身上产生不同意动效果。发送主体的意义意向只能是体现在发出文本上,而接收者的解释也是基于所接收的文本,并最终在解释中落实文本携带的意义要素。因此,发出主体的意向和接收主体的解释意向在文本中碰撞,模态、语力在文本中集合,而文本作为符号组合,是特定的媒介再现,通过再现媒介才能被接收者接收感知。而必须首先被解释出来的,是叙述媒介的时间向度,因为任何意义都是时间中的意义,只有确定时间向度,才能解释出叙述文本的意义。

所以,文本包含了模态、语力、叙述媒介及其时间向度,它们共同构成文本自身携带的解释规定,在这些解释规定作用下,接收者首先感知到的是体裁范畴。这些解释规定要素里,每一种模态、语力和叙述媒介的三种主导分类基本对应:陈述一言事—记录媒介—过去向度,疑问一行事—演示媒介—现在向度,祈使—成事—意动媒介—未来向度。因此,放在体裁分类上,可以相对整齐地划分出三类,它们简化表述为:记录类叙述、演示类叙述、意动类叙述。

将纪实类和虚构类,记录类、演示类和意动类交叉组合,赵毅衡归纳出五种基本叙述类型:纪实记录类、虚构记录类、纪实演示类、虚构演示类、纪实意动类。在五种基本类型之间,还存在一些亚类,比如拟演示类的心像叙述,记录演示类的电影叙述等。真正体现这三个区分原则、标准灵活性、适用性的,恰恰是对这些亚类型的解释。这些叙述体裁,和小说为代表的记录类叙述一起,构成广义叙述学研究对象。

(三)叙述主体:叙述者二象、不可靠叙述

上文说到,由于小说叙述体裁本身的限制,叙述者常常被认为是人格形态,但是叙述中经常找不到一个清楚可辨的叙述者人格,除了“第三人称”小说外,在电影、戏剧、游戏等非小说叙述中更难寻见。研究者由于缺少一个能够集合和概括叙述者的操作、声音、人称身份等诸多方面的概念和分析视角,在叙述者相关问题上很难达成令人满意的共识。广义叙述学不再限于小说叙述研究,自然,就要在不同叙述体裁中找出叙述者更为一般

的形态。

1. 叙述者“框架—人格”二象

叙述者是叙述发出主体,要找出叙述者的形态,需回到叙述的定义中去。根据叙述的底线定义,叙述是两个叙述化过程,第一次叙述化过程和痕迹都体现在叙述文本上,而第二次叙述化,实际上是叙述的解释。在上文讨论叙述体裁区分时已经说到,叙述的解释受体裁规定。由此,要确定叙述者形态,应当从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叙述文本、叙述解释、叙述体裁。从这三方面对各类叙述考察,赵毅衡提出了叙述者“框架—人格”二象。

二象形态观认为:叙述者发出的叙述是区隔出来的那个叙述,没有区隔,就没有叙述文本世界和实在世界的区分,这是叙述成立的前提。因此,区隔形成的框架标记,无论是具体的媒介、叙述指令形态,都体现着叙述者的发出行为,它们呈现为一种诸要素集合的“框架”形态;同时,叙述者可以是直接关联真实的人(作者、导演等)的表意人格^[6],也可以是真实的人分裂虚设的、不直接关联真实的人的人格^[7],这种人格在叙述文本、叙述解释中,可以体现为具体的人物角色,也可以是抽象的人格主体意向。因此,叙述者可以是抽象的概念框架集合里有具体的叙述人物,也可以是具体的、有形态的框架里蕴含了抽象的人格、填充了部分具体的人格。叙述者“框架—人格”二象是并存的。根据不同的叙述体裁,叙述者二象形态各有不同的凸显。

2. “不可靠叙述”

近几十年来,关于“不可靠叙述”,学界主要争议有三:第一,“第三人称叙述者”如何不可靠?第二,有没有人物不可靠?第三,泛不可靠观点,即纪实中是否也存在和虚构叙述中一样的不可靠叙述者问题,纪实叙述可不可以不可靠?这三个争议是赵毅衡在“不可靠叙述”问题上讨论的重心。

要说清楚“不可靠叙述”问题,首先需要界定这个问题内涵。叙述者是否可靠,是依据叙述者的人格与隐含作者是否一致。而在判断之前,需先明确三个概念:人格、叙述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可靠性问题争论不一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很多学者在这三个基本概念上就存在分歧。这里对这三个概念的明确,其实就已经开始解释赵毅衡对“不可靠性”问题的界定。

首先,关于叙述中的人格的内涵。在广义叙述学的讨论中,人格是文本意义人格,而不是现实中的人格,而根据叙述底线定义,叙述文本意义主

要是关于意义价值、道德伦理,不关乎事实验证,因此,人格是指有关意义价值、道德伦理的文本人格。第二,叙述者的人格,上文已经说了叙述者的“框架—人格”二象,二象形态强调“框架”与“人格”并存。第三,隐含作者概念。关于隐含作者如何生成,学界一直存在分歧,主要分为两派,隐含作者是作者的执行人格,和隐含作者是从文本中归纳推断出来的人格。赵毅衡依据不同叙述体裁,采纳不同的观点,提出在纪实叙述中,隐含作者是作者的执行人格,而在虚构叙述中,隐含作者是叙述文本推断出来的人格。

在明确人格、叙述者、隐含作者概念后,叙述者可靠性问题,在赵毅衡看来,可以界定为:具备“框架—人格”二象的叙述者,他的人格,主要是意义—价值观,是否和隐含作者一致。具体到不同体裁上,叙述者可靠性问题是:纪实叙述中,叙述者人格是否和作者的执行人格一致,虚构叙述中,叙述者人格是否和文本推断出来的意义—价值观一致。

对叙述者可靠性问题的界定解释清楚后,根据纪实叙述体裁所规定的叙述和现实直接相关,赵毅衡认为,纪实体裁中叙述者必定可靠。这是因为纪实叙述体裁规定叙述者和作者的人格一致,而纪实叙述中隐含作者是作者的执行人格,因此叙述者人格和隐含作者人格一致。至于纪实叙述中出现的撒谎、篡改、歪曲事实,这是叙述与客观事实不一致,是作者不可信,叙述者人格和隐含作者人格是处在文本中,这两个文本人格之间的一致性并不受影响。然而,纪实叙述中,可能会出现部分不可靠,但最终不可靠部分会被纠正,从而全局可靠。

为什么会出现部分和全局不可靠之分?因为除了人格形态,叙述者还同时具备框架形态。框架形态中,叙述者的人格会以框架中的各种人格要素组合显现。前文在解释框架形态时已经说到,包括叙述框架中会出现叙述干预、次叙述者、人物、叙述视角等人格要素。这些人格要素中会出现和叙述者框架整体显现出来的人格不一样的地方,这时,就造成叙述者局部不可靠。当局部不可靠过多,或者之间冲突,且无法从叙述文本中找到一个意义—价值定点,这种情况下,就往往是全局不可靠。局部不可靠可以被纠正,从而全局可靠,也可不纠正或纠正失败,导致全局不可靠。这种不可靠纠正在具体的叙述文本中如何体现,还有待未来研究。这是广义叙述学在“不可靠叙述”

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新问题。

由此,回到本部分开头所提出的“不可靠叙述”的争议,赵毅衡对可靠性和可信性的区分,对不可靠性的局部、全局的区分,事实上否定了泛不可靠性观点,回答了纪实叙述必然根本上可靠:由于第三人称叙述的叙述者凸显为框架叙述者,他的人格部分是以叙述各个人格要素组合、填充在框架中,分别考虑这些人格要素是否与隐含作者冲突,由此可发现“第三人称”叙述存在叙述者局部不可靠和全局不可靠的情况。人物是填充叙述者框架的人格要素的一种,影响到叙述者的人格,因此人物也存在是否可靠的问题。

(四)叙述过程中的二次叙述化

叙述包括发出叙述,即一次叙述化,和接收解释叙述,即二次叙述化。一次叙述化主要是选择和组合人物参与的事件变化,并组织进入符号文本中,形成携带情节的叙述文本,然而,情节可能含混矛盾、充满歧义,需要接收者在解释中回溯、重构,或者创造性解读,以“落实”媒介化了的情节中各要素的意义,包括媒介内在时间向度携带时间意义,情节中的人物参与事件变化携带了伦理价值意义。赵毅衡将时间意义和伦理价值意义更加明确为时间—因果和逻辑—道义两种。

二次叙述保证叙述的完成,要解释的是具有情节的叙述文本,那么谁来进行二次叙述?赵毅衡认为二次叙述化的主体不能个体化成单个的接收者,因为这可能造成解释的相对主义,也不能完全泛化成所有的观众、读者、参与者,因为任何叙述都有体裁规范,是发送者和接收者达成的意义交流契约,不是任何接收者都是这个契约期待的对象。基于此,赵毅衡从叙述作为人类社会文化认知和交流的方式出发,认为拥有文化条件和认知能力的“解释社群”,能解释(包括创造性地解释)出叙述所期待的理解方式。解释社群依赖叙述文本期待的方式进行二次叙述,而叙述文本期待的方式和叙述体裁密切相关,由此赵毅衡区分出三种主要方式及其常对应的叙述体裁^[4]106~118。

叙述解释在后经典叙述学中研究颇多,尤其在认知叙述学中,以“自然”叙述学和“非自然”叙述学为代表。“自然”叙述学坚持叙述是模仿口头叙述典型,叙述解释要“自然化”为口头叙述的那种自然^[8],而“非自然”叙述学恰恰强调各种叙述中出现的诸多违反模仿常规的叙述,提出解释方式的多样性^[9]。

二次叙述调和了这两种叙述解释的冲突,又

弥补了各自的不足:一方面,二次叙述认同解释主体的“归化”能力,但不是“归化”为口头叙述,而是“归化”为社会文化规约下的常识,这避免了“自然”叙述学自限在口头叙述体裁而忽略了其他叙述类型的不足;同时,二次叙述的诸多方式,呼应了“非自然”叙述学提出的对反模仿叙述的创造性解释策略,而且,赵毅衡进一步将这种创造性归因于解释社群和叙述文本本身的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次叙述概念集中体现了广义叙述学既考察各种叙述体裁,又关注叙述文本和叙述解释及两者的相互作用,这是广义叙述学区别于其他叙述研究理论的两大特点。

四、总结

综上,所有对赵毅衡叙述思想的论述,可以提炼出六个关键的创见性命题:形式—文化批评论,叙述底线定义,叙述体裁分类原则标准,叙述主体分化和分裂方式,叙述自指悖论,二次叙述化。无论是小说叙述学,还是广义叙述学,赵毅衡的叙述学一直都在引领叙述学新的发展模式。

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国内叙述学发展环境下,赵毅衡的小说叙述学为中国叙述学的本土化做了有效尝试。赵毅衡在西方形式批评和中国内容批评两种极端中,取乎其中,提出了形式—文化论。在这一方面,给当时国内内容批评热潮“降温”,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形式分析完全搁置文化的不足。赵毅衡将形式与文化意识形态结合,这种中间道路是摸索出中国叙述学发展道路的一次成功尝试。

其次,21世纪后的广义叙述学,打破叙述学的中西分野,为中国叙述学本土化之后,叙述学在中国如何发展,指出了新方向,即建构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21世纪后,赵毅衡很少再讨论叙述学的“中西”问题,这与他关注普遍的形式理论这一目的有关。“有效的理论不应当有国界”^[10]。叙述学划定中西分野容易自我设限。这是赵毅衡从80至90年代的小说叙述学发展到21世纪后的符号叙述学的自然思考结果。

已经有学者,如王瑛^[11]、伏飞雄和李明芮^[12],提出广义叙述学开启了叙述学研究的第三阶段。在叙述学发展史问题上,一般都认为叙述学发展目前经历了两个阶段:结构主义模式的经

典叙述学阶段,和后结构主义时期多种叙述理论流派并行的后经典叙述研究阶段。赵毅衡指出,这两个阶段核心都是“过去时向”“虚构”的小说叙述学。在广义叙述学所建构的适用于一般叙述类型的理论框架下,小说叙述降级成为叙述学研究的一部分。随着叙述研究范围的扩大,广义叙述学提出了诸多新的叙述学研究问题、方向和思路,这些都已经中国学界逐步推展开来。广义叙述学已不止是个人提出的理论构想。在诸多后来学者的研究发展推动下,广义叙述学所代表的叙述学研究第三阶段,应当说已全面打开。

【参考文献】

- [1]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2]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 [3]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57-161.
- [4]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7.
- [5] 赵毅衡.论二次叙述[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21-122.
- [6] 赵毅衡.新闻不可能是“不可靠叙述”[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51.
- [7] 赵毅衡.论虚构叙述的“双区隔”原则[J].外国文学研究,2014,36(5):140-141.
- [8] FLUDERNIK, MONIKA.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9] RICHARDSON, BRAIN.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15.
- [10] 赵毅衡,胡亮.成都对话:禅剧·美国现代诗·“小聪明主义”[EB/OL].符号学论坛,(2009-08-26)[2023-02-17]. <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view/index/theory/3521>.
- [11] 王瑛.广义叙述学:叙事诗学发展的第三进阶[J].河北学刊,2015(1):110-113.
- [12] 伏飞雄,李明芮.一般叙述学视野中的叙述定义:与赵毅衡先生商榷[J].符号与传媒,2020(2):220.

[责任编辑:王作华]